

李醒民 主编

见微知著

——中国学界
学风透视

目前我们中国的文章是越发越多，而且是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刊物也越办越多，而且还不断出增刊。但是这些表面上是数量大跃进式恶性膨胀的同时，学术质量、学术水准非但没有呈正比例提升，反倒有的还在严重滑坡。有的中青年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三四百篇论文，有的人写简历动不动就说自己有上千万字的著述……

河南大学出版社

见微知著
——中国学界
学风透视

李醒民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微知著:中国学界学风透视/李醒民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81091-439-1

I. 见… II. 李… III. 学术工作—中国—文集
IVG3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446 号

责任编辑 纪庆芳

封面设计 张 胜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91 千字

ISBN 7-81091-439-1/G·776

定 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龚育之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曾经组织过一个以“共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为总题的笔谈专栏，持续时间达一年多，发表文章六十余篇。杂志的主编李醒民同志，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编成《见微知著——中国学界学风透视》这本书，嘱我写序。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但是，学风建设，包括自然科学的学风建设、社会科学的学风建设以及自然辩证法这样的介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的学风建设，在学界内外，足应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这部书的出版，当会为正在开展的这场讨论助一臂之力。我不揣冒昧，勉力来写这篇序，也算是为推进这场讨论添一声呐喊吧。

在学界之内的这场讨论中，自然科学界是走在前头的。我记得，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生物化学家邹承鲁院士就曾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和全国政协几处郑重场合，几度登高引领，呼吁抵制和反对学术腐败。而且坚持不懈，直到去年在沈阳召开第四次全国科防大会上，邹老还以此为题，再次发表演说。不说“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也该说是“登高一呼，四方回响”吧。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委员会为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近日在报端公布了调研成果，提出当前我国科学道德和

学风建设中不端行为的七种表现(报上把它戏称为“七宗罪”,这是早期基督教的用语,指虚荣、贪婪等七种罪恶),分析了产生这些情况的多方面原因,为治疗学术不端行为开出了“五味药方”。在这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科协今年还准备制定学术交流、论文发表、期刊编辑等方面的道德公约,开设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论坛。应该说,这是对学风建设问题最强烈的、最有组织的响应了。社会科学界也急起直追。就我看到的而言,至少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和北京的《中华读书报》上,已经看到对这个问题的锐利评论和热烈争论。

《自然辩证法通讯》呢,在这个杂志上进行的学风讨论又有它自己的特点。一是关注自然辩证法研究本身这个专门的边缘科学领域,分析和剖析这个领域的状况、问题、原因、症结和对策,这是别的报刊不大会注意的;二又不限于这门边缘科学本身,而是旁及整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沟通这两大学界围绕同一主题讨论,促进这两大学界学风建设交流。应该说,科学领域的学风问题,正是科学哲学、科学历史、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项内容和对象,而《自然辩证法通讯》不正是其中之一吗?

共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

——《见微知著:中国学界学风透视》前言

李醒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学术研究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学术规范失常、学术道德滑坡之事时有发生。纵观当今中国学术界,在学术社团的组建、学术站点的设置、学术职务的评聘、学术资源的分配、学术成果的评价、学术奖励的颁发、学术刊物的运作、学术论著的出版、学术规章的制定等方面或缺乏规范,或有规不依,或规范本身不尽合理,从而贻害于中国的学术事业。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自1990年以来,在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熏染下,学术界的各色丑闻也接连不断,剽窃抄袭及一稿多投之风蔓延。与此同时,醉心于和献身于学术研究的真正学人日减,相当一批学界之人甘居平庸,乃至追求平庸,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为促进21世纪中国学术的繁荣,为营造一个健康的学术氛围,使学人养成良好的学风,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山西大学于1999年12月8日在北京以“共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为主题,联合召开了小型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围绕主题,针对目前学术失范的表现、根源及矫正措施,以及中国学术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直抒己见。《自然辩证法通讯》为此专辟了“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笔谭”专栏,把部分发言稿予以发表。

自2000年第2期开辟笔谭栏目以来,全国各地学人和读者踊跃来稿来信,对《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举动予以积极支持和热情回应,认为这一讨论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光明日报》、《学术界》等有关媒体和学术刊物对此讨论也做了报道、介绍和评论,并转载了部分笔谭文章。笔谭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截止2001年第4期续完,笔谭栏目共发稿9辑计65篇。这些文章或揭露现实,针砭时弊;或条分缕析,追根溯源;或陈言建白,责无旁贷。其心诚,其情真,其意切,其理正,其辞严,读后令人铭感不已。综观这些雄文净言,大体集中在学术异化和学术腐败的现状、根源和纠正措施三个方面。

一、学术失范司空见惯,丑陋的学术人神通大显

这是十余年来中国内地学术界的真实现状。主要表现在:掠人之美、弄虚作假、剽窃抄袭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东拼西凑,胡编乱造,改头换面,瞒天过海,以达到捞取外快、沽名钓誉的“写手”和“编书匠”如过江之鲫;以权谋私,官大学问长,“官尘暴”严重侵袭学术界;研究人被异化为市场人,不练坐功练腿功,为捞取基金、奖项、职称、站点等实惠和好处,东奔西跑,贿赂风行;功利至上,大肆炒作,将学术当作摇钱树和敲门砖,玩于股掌之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华中理工大学课题组的调查统计,科学研究和同行评议中的制度性越轨行为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其违规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更要命的是,高等院校的莘莘学子也在社会不正之风的熏染下,步其“师长”之后尘,纷纷效尤,从而给学术之未来蒙上一层阴影,着实让人堪忧。

二、学术失范和学风日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深蒂固的
外部原因存在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先后出现的极左政

治的统治和极左思潮的泛滥,民主法制的健全,道德在某些方面的失范和滑坡,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的侵蚀,官本位、实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风靡,这一切,给中国学术界深深打上了政治化、功利化、官僚化、世俗化以及平庸化、浮躁化的印记。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固有弱点,也使得学术界缺少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大胆创新、勇于批评的学人。

内部原因一分为二。就学术共同体本身而言,基本上是官办的,自然得受长官意志左右,难得有真正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而无法在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建立或实施有利于学术健康发展的学术规范。即使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学术共同体的有关规范或平面化、或形式化,甚或很不合理。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致使在学术活动中非学术因素乘虚侵入,甚至反客为主,从而助长了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蔓延。学术批评乏力和学术制裁的缺席,又无法使学术腐败和学术异化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就学术人自身而言,自律意识淡漠乃至缺位,道德滑坡乃至沦丧,也是造成学风不正、学人扭曲,乃至沦为丑陋的学术人的重要缘由。

三、标本兼治,自律与他律并举,以清除流弊,匡正学风

为此,来稿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建议。在外部,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立法维护学术界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营造自由、健康的学术氛围;实行吏治改革,政学分开,从根子上铲除“官尘暴”对学术界的侵害;通过各种渠道,逐步壮大民间学术力量,使学在官府走向学在民间;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充分利用舆论和法律,惩治学界的败类和不法之徒……

作为学术共同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争取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坚持学术界独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侵扰;完善评价机制和奖励系统,从正面积极引导;加强制度和规范建设,发挥各个学术环节中“守门人”的监督和

防范作用;积极开展学术批评,把歪风邪气消灭在萌芽状态;参照国外惯例,在学术界设立道德委员会或反欺诈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调查和处理有关违规事件。作为学术人,要充分认识学术是一项严肃而神圣的事业,不是谋生和晋爵的手段,从而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道德观念,达到治学与做人、作品与人格的统一。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子是学术事业的后备军,因此对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敬业和道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并在招生、培养、考核、授学位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像这样内外结合,标本兼治,中国学术界的学风可望伴随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进展而在21世纪有所好转。

本文集是在笔谭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对于原有的文章,大多数作者都做了修改和增补,各文的字数也由原先的1500字增加到3000字左右。由于时过境迁,与少数作者难以取得联系,只能按原文收录(希望这些作者见到文集后,及时与出版社或主编联系,领取样书和稿酬)。另外,还添加了数篇发表在其他刊物的同类文章。72篇文章大体按内容分配在“失范概览”、“原因剖析”、“规范建设”、“道德整饬”、“学人自律”五编中。不用说,这种分法并不是很严格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依其重心或出于方便,因为同一文章大都涉及多方面的内容。

我们深知,中国学术界的学风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已病入膏肓,非得下猛药不可。学风问题又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和其他现实问题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确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然而,我们对中国学术界的未来还没有失去信心,也相信通过社会大环境的逐步改善和学人的不懈努力,事情总会起变化。我们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起讨论,我们在几年后编辑本书,都是为了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摩顶放踵,虽愿效于微劳;以蚊负山,顾难胜于重任。”不过,我们希望本书多少能起一点催化作用,唤起或团

结更多的学人和志同道合者,共同担当起匡正学风的重任。果能如此,则幸甚至哉!

2004年2月28日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本文有关部分采用了《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第1页“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笔谭”“编者按”和2001年第4期第12~15页“编后语”的文字]

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学术腐败问题答问录

杨玉圣

问：近来，学术腐败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应如何界定“学术腐败”呢？

答：学术界、知识界的专家学者越来越重视学风问题的重要性。继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提出“精品战略”后，北京大学在今年4月27日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文科科研大会，提出“提倡精品，拒绝赝品”。有关报纸、刊物、电台、网络等媒体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学术腐败的话题。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好现象。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关于“学术腐败”的界说。这只是就目前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等严重存在的学风文风问题、学术道德败坏等现象的一种笼统的说法。

问：一般而言，学术腐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学术腐败的表现多种多样，其中以下现象最为明显：

（一）低水平重复。其中以高校教材、教参为最显著。据《中华读书报》报道，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超过300种；这数百种教材，出自不同的编者之手，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书名也不尽相同，有的叫概论，有的叫新论，有的叫教程，有的叫纲要，有的叫新编、简编，等等，但编写内容、体系设计、章节顺序、原理以及具体的例子，都大同小

异,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抄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钱乘旦教授在《中国书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从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视角评论国内不同版本、但相差无几的几十种世界近代史教科书的书评,也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鸡生蛋、蛋生鸡”,从教材到教材的编写模式的弊病。其实,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情况,还不仅仅止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近代史教材,其他如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中共党史、大学语文、中国文学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等高校基础课教材,也往往异曲同工。有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实在看不惯这种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行为,开诚布公地评论说:“什么主编、副主编、新编、合编,还不如称‘主骗’、‘副主骗’、‘新骗’、‘合骗’,用这样的书去教学生,简直是误人子弟。”

(二)粗制滥造。这以形形色色的辞书最有代表性。本来,编字典、词典等工具书,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们靠长期、大量的劳动才能做的一种苦差事,既艰辛备尝,又严肃认真,“辞书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但最近二十年来,和编教材一样,编辞书却一下子成为许多人所谓“快速成才”、“发家致富”的捷径。而且,无论水平高低、懂还是不懂,似乎什么人都可以编、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什么人都在编辞书。如同有“教材专业户”一样,也有大量的辞书编纂专业户,其中最大的辞书专业户就是一度誉满全国、大名鼎鼎的王同亿先生,十几年间编了25部辞典,字数达1亿7千万字。可以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大多数辞书,内容上粗制滥造,种类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差不多都是捞名捞利的投机性勾当。

(三)泡沫学术。目前我们中国的文章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刊物也越办越多,而且还不断出增刊。但在这些表面上是数量大跃进式恶性膨胀的同

时,学术质量、学术水准非但没有呈正比例提升,反倒有的还在严重滑坡。有的中青年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三四百篇论文,有的人写简历动不动就说自己有上千万字的著述。据说,山东某经济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 万字”这样的天文数字。刚才讲到的王同亿先生请人在《光明日报》为他拍了一张他与他主编的书的合影照片,书摆起来也确实比 1.60 米左右的他矮不了多少,号称“著作等身”。不少人的文章遍地开花,三天两头出书。这样一来,名义上是学术论文、专著,实际上却差不多是学术垃圾。这种情况,理科有,文科更多。

(四) 假冒伪劣。假冒他人名义,搞所谓的“著书立说”。山东某大学社科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人,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反复复印,差一点儿弄假成真,后因知情人的揭发而露馅。许多地方院校的人,为了评高级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然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作为他的所谓“成果”。在北京,一度有人自甘堕落,公开在电线杆子上大摇大摆地贴“告示”,明码标价,公开卖稿。不少省(市)宣传部门的领导,有的尽管水平不怎么样,但也往往热衷于挂名主编各种各样的书,而且往往印得极其大方、气派、豪华,然后下文订购、推销,实则是公款消费,但这些书大都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废纸。年逾九旬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 1997 年 10 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大家都知道《皇帝的新装》这个童话。近年来,语言文字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皇帝新装’的事情。有人抄袭别人的词典,有人不懂装懂,在基本常识问题上乱说一气;甚至还有人拿钱买‘教授’和‘博士’的头衔……这些本来很荒唐的行为,反而被大肆吹捧,说他们是‘辞书大王’、‘著名语言文字学专家’、‘发明了某某定律’等等,这和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不是一样吗?”

(五) 抄袭剽窃。这已经成为一大学术公害。《方法》杂志编辑部的文章称之为“学术蝗祸”，“这场蝗祸近年来正在学界蔓延并严重蚕食着学术界的人格规范和学术规范”。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对此痛心疾首。在《“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一文发表后，我曾陆续收到一些朋友的来信，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先生的来信最让我感动；这位学富成就的老先生感慨：“现在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不仅有剽窃国人著作的土匪，而且有剽窃外人论著的海盗；不仅在年轻人当中有这类现象，而且有极少数博士生导师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也是这么做的；这类假冒伪劣作品不仅能出版，而且可以获得规格甚高的优秀成果奖。你想提出批评吗？……真是困难重重！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努力，但收效甚微；因为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权。”

(六) 沽名钓誉。有不少非学术界的人，在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以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关系或金钱关系，以利益作交换，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一些名牌大学的客座教授、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些名号一旦到手后，即去掉客座、名誉、顾问、兼职字样，以“教授”的名分招摇过市，捞取更大的学术荣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当读到伍铁平教授的《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一文以后，不少学者开诚布公地表示，现在学术界不是有没有骗子的問題，而是有多少骗子的问题。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中国还是一个高等教育相当落后的国家，但二十多年来真真假假的教授数量增长之快、人数之多，却是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李岚清副总理于1997年9月19日给原国家教委作过这样一个批示：“教授是一项崇高的称谓，有的国家甚至一个系只能有一位教授。兼职教授不是不可以，但一是本人得够资格；二是要有需要；三是要名副其实，要上课、讲学、搞科研。否则教授贬值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的耻辱。”

(七) 高等教育和学位注水。比如,在北京,在全国,到处是公开制造贩卖假文凭的。究竟有多少张假文凭已经散落在正在流入民间?究竟有多少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靠假文凭在谋取权力、职称、地位、名誉和利益?也许,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光明日报》2000年2月19日发表该报记者朱振国的报道说: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学位证书认证工作以来,从该中心为国内一些用人单位、接受升学单位及国外有关机构所进行的认证情况看,假冒学位、学历证书大约占申请总数的20%。这篇报道还披露说:“甚至经国家公证部门公证后到国外使用的学位证书也有假的,有的假冒证书连授学位的学校本身都不存在。公安部门在北京、南京、深圳、武汉等地陆续破获了伪造、贩卖假证书的犯罪团伙。他们使用的制假工具先进,伪造的证书逼真,假冒证书的数量和扩散范围相当惊人。”无独有偶,《环球时报》2000年2月25日发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新加坡记者李士君的特别报道《假文凭骗到新加坡》终于证实,“许多人拿着假文凭招摇撞骗,有的人居然还骗到了国外”:一个原毕业于青岛医科大学、名叫刘春申的33岁的中国籍男青年,在北京花了100元人民币让人伪造了一张北京医科大学的博士文凭、冒充医学博士,于1999年12月侥幸联系到新加坡一家有名的医院工作,但没过几天,即东窗事发,结果被判罚坐牢两个月、并处罚款两千新加坡元。这不仅是拿假文凭行骗骗到了外国,而且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举还把中国人的脸一股脑儿丢到了世界。据说,在北京,除了北大南门附近,中国人民大学校门附近也是卖假文凭卖得热火朝天的黄金地段。在堂堂的名牌学府所在地,居然红红火火地高声叫卖假文凭,此可谓第一怪;明明是造假贩假、而且危害无穷,但愣是没人管,可谓第二怪。大概全世界再也找不着第二个国家——暂且不论其国土大小、人口多少、贫抑或富——能够像我们国家这

样在大学门前自由自在地摆摊设点公然叫卖假文凭的了。

(八)学术评审深度腐败。在学术职称评聘、学术奖项评审、科研基金与项目评定等环节中,一直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最主要的是,利用权力关系,垄断学术资源。以正在走向异化的学术评奖为例,如果说它原本具有奖励机制的话,那么,现在的学术评奖正在越来越名不副实,正在急剧地退化为它的反面。更可怕的是,这还正在成为学风不正、学术腐败的一个新的源头和生长点。由于体制使然,学术评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退化为某些学界特权人士维护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由此而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获奖专业户”。在刚刚过去的2000年,以《读书》杂志和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的名义举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尽管据称曾“取经诺贝尔”,“想把这一奖项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其评奖过程也曾被认为是“学术民主动人的一幕”、“前所未有的认真”,但终因其评奖委员会名誉主席获荣誉奖、《读书》执行主编兼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获著作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获文章奖而在学界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有众多专家学者广泛参与的学术评奖问题大讨论。再如,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最近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社会学(1994~1998年)优秀成果评奖中的学术腐败现象,称之为“学术腐败在政府评价体制中的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可思议的是,“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在一次评奖的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再举一

个例子，一套存在严重抄袭剽窃问题的丛书获得国家大奖——2000年“中国图书奖”。这套荣获国家大奖的书叫《陇文化丛书》（共10册，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甘肃省政协主席任编委会主任），其中有一册叫《竹木春秋》，作者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震亚。问题在于，正好是这本《竹木春秋》，已有不止一位专家公开撰文批评其存在的大量硬伤和大量抄袭现象，如张俊民除发表《〈竹木春秋〉征引敦煌汉简商榷》（《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简评〈竹木春秋〉》（《陇右文博》2000年第1期）外，还与唐晓军合作发表了《简牍学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竹木春秋〉征引居延汉简同王震亚先生商榷》（《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就该书中存在的史料引用硬伤问题进行了认真批评。尤其是《学术界》2000年第4期发表的章仁和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评〈竹木春秋〉》，可以说是一篇把事实摆够、把道理讲透的长篇评论，对《竹木春秋》这部严重存在大量硬伤、抄袭剽窃（特别是大肆抄袭未发表的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现象的伪劣之作，加以严肃批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书评文章都发表在中国图书奖评选之前。

问：像抄袭剽窃、弄虚作假这样的学术丑闻，最近被揭露出来的越来越多。你在《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发表的文章中列举了一系列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名字，像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等，有这么严重吗？

答：我非常感谢《中华读书报》能够把这个不光彩的名单正式公布出来。上了这个名单的，都是已经公开在报纸、刊物、网络媒体中披露出来的。十多年来，此类学术丑闻不绝如缕，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地域上看，遍布大江南北，殃及北京、上海、南